

党史资料

丛刊

第二辑

DANGSHI ZILIAO CONGKAN

党史资料丛刊

一九八三年第二辑

(总第十五辑)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8 1/32 印张 5 字数 124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600

书号 3074·679 定价 (六)0.50 元

内部发行

党史资料 月刊 目录

一九八三年
第二辑
(总第十五辑)

回 忆 录

上海地区党组织的活动

- 三十年代初江苏省委沪西区活动片断 帅孟奇 (3)
抗战时期江苏省委的一些情况 赵 先 (7)
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 孙冶方 (10)
江浙区委派我去浙江工作的一些情况 蒋振东 (13)

武装斗争和地下交通线

- 孟良崮战役 王 德 (21)
东路地区到上海的地下交通线 蒋国梁 (29)

共青团和上海学生运动

- 回忆三十年代团中央的一些情况 唐益之 (34)
关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团江苏省委的
一些情况 戚铮音 (38)
三十年代上海共青团的部分活动情况 胡瑞英 (41)
抗战胜利前后交大学生运动片断 吴增亮 (44)
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交通大学的学生运动 庄绪良 (55)

专题研究

- “五四”时期陈独秀思想的转变 任建树(69)
- 关于“杭州西湖会议”的一场争论 杨振亚(82)
- 共产国际、苏联和中山舰事件 向 青(94)
- 共产国际与中国党的三次“左”倾错误 郑德荣 何荣棣(114)
-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
态度和方针 刘以顺(139)
- 抗战胜利前后赫尔利的“调处”和
苏联的对华政策 胡庆云(148)

读者来信

- 刘少文应是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罗晓红(154)
- 创办《向导》不是“二大”的决定 俞乐滨(154)
- 关于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的的时间 黄国秋(155)
- 在《每周评论》撰文介绍《湘江评论》的
应是胡适 黄国秋(156)
- 抗战胜利后,刘晓从延安到上海经过的路线 赵 铮(156)
- 对皖南事变中傅秋涛等突围情况的一点补充 张 鏊(157)
- 关于潘兰珍的情况 张 君 陈善学(158)
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党史资料 月刊 目录

一九八三年
第二辑
(总第十五辑)

回 忆 录

上海地区党组织的活动

- 三十年代初江苏省委沪西区活动片断 帅孟奇 (3)
抗战时期江苏省委的一些情况 赵 先 (7)
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 孙冶方 (10)
江浙区委派我去浙江工作的一些情况 蒋振东 (13)

武装斗争和地下交通线

- 孟良崮战役 王 德 (21)
东路地区到上海的地下交通线 蒋国梁 (29)

共青团和上海学生运动

- 回忆三十年代团中央的一些情况 唐益之 (34)
关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团江苏省委的
一些情况 戚铮音 (38)
三十年代上海共青团的部分活动情况 胡瑞英 (41)
抗战胜利前后交大学生运动片断 吴增亮 (44)
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交通大学的学生运动 庄绪良 (55)

专题研究

- “五四”时期陈独秀思想的转变 任建树(69)
- 关于“杭州西湖会议”的一场争论 杨振亚(82)
- 共产国际、苏联和中山舰事件 向 青(94)
- 共产国际与中国党的三次“左”倾错误 郑德荣 何荣棣(114)
-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
态度和方针 刘以顺(139)
- 抗战胜利前后赫尔利的“调处”和
苏联的对华政策 胡庆云(148)

读者来信

- 刘少文应是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罗晓红(154)
- 创办《向导》不是“二大”的决定 俞乐滨(154)
- 关于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的的时间 黄国秋(155)
- 在《每周评论》撰文介绍《湘江评论》的
应是胡适 黄国秋(156)
- 抗战胜利后,刘晓从延安到上海经过的路线 赵 铮(156)
- 对皖南事变中傅秋涛等突围情况的一点补充 张 鏊(157)
- 关于潘兰珍的情况 张 君 陈善学(158)
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三十年代初江苏省委 沪西区委活动片断

帅 孟 奇

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从苏联回国，先在杨树浦工厂区搞工人运动，后来由于武汉党组织遭到破坏，李立三认为我刚从苏联回来，身体又很好，因此决定把我调到武汉新成立的长江局去工作。我和关向应一起去武汉，被分配在长江局秘书处。长江局领导人是任弼时，他经常来指导工作。不到三个月，长江局秘书被捕，关向应、任弼时都不来了。这样，我又回到上海，去找李立三。那时，李立三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错误，并在党内开始检讨。一九三〇年十一月，他派我到浦东日华纱厂去工作，指示我要深入群众，和群众打成一片，通过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去争取群众，组织群众，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。我到工厂后，首先向群众宣传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，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反日救国运动。那时，我们搞工会工作的面也比过去宽了一些，不光是搞赤色工会工作，而且已经开始搞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，注意去争取黄色工会中的部分表现好的工头和群众，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。

后来，浦东日华纱厂党组织遭到破坏，党组织在一九三一年六、七月间把我调到沪西区委，在日商内外棉七厂和喜和纱厂做女工工作。一九三二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，十九路军奋勇抗日，我们

抓住这一民族矛盾上升的有利战机,放手发动群众,反对日本帝国主义。开始,我们去喜和纱厂发动群众,后来又到店内外棉七厂做宣传工作。我们用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中国工人、特别是养成工的大量事实进行宣传,使广大工人群众懂得日本资本家是怎样剥削中国工人的。我们还将日军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、“一·二八”事变,以及在闸北、宝山等地杀人放火等罪行编成材料进行宣传,号召群众组织起来,收复东北失地,保卫上海,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当时,罗登贤和张浩都在那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。由于过去党内推行立三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错误,党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,原来在沪东区工作的陈赓的爱人王根英和周超英、仇爱珍、田文达等同志已经不大参加群众工作了,趁着当时有利的革命形势,我就去动员她们,她们又都很快地投入了当时的反日救国运动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上海各阶层的群众组织,如工人反帝大同盟、学生反帝大同盟、教师反帝大同盟、文化界反帝大同盟、妇女反帝大同盟等等积极开展活动,群众反日救国的情绪十分高涨,大家都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。当时,日商纱厂集中于沪西,沪西区委领导纱厂工人成立了沪西区罢工委员会,我们发动群众占领了黄色工会开会的地方——沪西公社,把它变成沪西区罢工委员会活动的场所。沪西是上海人民抗日救国的大本营,饶漱石和张浩经常在那里开会研究如何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去支援十九路军抗战。工人反帝大同盟也积极开展活动,在沪西日商纱厂和沪东的橡胶厂、浦东的日华纱厂的十几万工人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,并大量地发展反帝大同盟会员,只要是抗日爱国的都可以加入反帝大同盟。在抗日救国斗争中,党组织也注意选择优秀工人,发展党员。当时我们的口号是:工农兵知识分子团结起来,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我们还派人去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联系,向他们表示上海工人和各阶层人民支持十九路军官兵抗战。在罢工工人中,我们

组织了救护队、担架队、自卫队和募捐队。募捐队得到宋庆龄、何香凝的支持，我们把募捐得来的钱在沪西公社开大锅饭，使积极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和工作人员有饭吃，从经济上支持了工人反日罢工的长期斗争。工人反日大罢工活动场所——沪西公社在当时有“小苏维埃”之称。

日本纱厂工人由于长期进行反日罢工斗争，生活十分困难，所以当时除了继续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，反对《淞沪停战协定》外，还提出复工的条件，要求增加工资、改善待遇。最后每人每天增加了一、二角工资才复工。当时，我们曾发动沪西区工人去包围国民党市政府，反对蒋介石妥协卖国、压迫工人，要求给罢工停业的工人发生活费。经过反复的斗争，最后国民党政府答应给每个工人每天补助四角钱，发了一个月。

一九三二年“三八”妇女节，我们曾以工人反帝大同盟妇女部的名义公开发表抗日救国宣言，这宣言是经过邓中夏修改的，很有鼓动性，当时有不少家庭妇女在宣言的鼓动和启发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那时，邓中夏由于王明的打击而下放到沪东区委当宣传部长，我请他帮助修改宣言时，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了，他很开朗地说：“共产党员能上能下，为了革命工作到什么地方都应当安心。”他的话对我们的教育很深。

一九三二年“五一”节时，国民党已经实行白色恐怖，经常抓人，我们不能公开发表宣言。邓中夏教我们把宣传的内容简单扼要地写在折扇里，送给工人使用，让扇子在工人群众中流传，这也起过很好的作用。

一九三二年五、六月，我从沪西转到闸北做丝厂女工的工作，领导人是江苏省委秘书长陈谭秋。闸北丝厂大部分是日本人开的，丝厂里多数是女工和童工。日本老板赚了许多钱，最怕工人罢工。我们就发动群众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，反对出卖人民利益的

回 忆 录

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提出不给日本人做工，不帮日本老板赚钱的口号，组织了闸北丝厂女工罢工委员会，主席是老张同志，我担任副主席。罢工持续了半年时间，给日本丝厂老板造成很大的损失。罢工二、三个月后，日本老板找我们谈判复工条件。当时，由于淞沪战争，工人罢工停业，生活十分困难，许多人吃不上饭，我们就提出复工条件，要求把事变前丝厂童工工资每天一、二角增加到五角钱，女工每天工资增加到七角钱。罢工又拖了几个月，最后日本老板同意童工工资增加到三角钱才复工。

（李华明、宋士龙、刘璣章一九八〇年三月访问整理）

抗战时期江苏省委的一些情况

赵 先

我于一九三一年二月经林枫(原名宋书尚)介绍入团,不久担任溧阳县团委妇委书记。一九三三年下半年,溧阳县团委负责人张云仪被捕(原名张椿生,解放后在江苏省农林局),而江苏省委巡视员又不来,工作无法开展。一九三四年二月,我和林枫等离开溧阳到了上海。在上海,我参加了“左联”,搞女工识字及大众化写作等工作。一九三五年一、二月份,邓洁组织临委(临时工作委员会),我们转入临委,在教育委员会工作。一九三七年刘晓来上海,住在爱文义路(现北京西路)一个裁缝铺的楼上。我是第一批被审查接受的党员。我第一次见到刘晓是在威海卫路陕西路口美孚加油站楼上(现市业余工大对面)我家里。冯雪峰、潘汉年也常到这里来和刘晓碰头。在上海党组织交接之际,我的家成了联系点,由我做掩护工作。刘晓来时曾带给我们彭雪枫等同志写的文章。王尧山做政治交通员时曾带来延安有些同志以私人名义写给程潜、张群等国民党大员的信。后来由周金水代替王尧山做政治交通,周的爱人宋琴芬做掩护。周是通过我与王尧山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的。

一九三七年十月或十一月成立江苏省委。省妇委书记是陈修良,委员有我和刘少文的爱人罗晓红,我负责做救亡团体的妇女工作。在这期间曾接受过救亡团体转过来的一些党员。我们工作的对象包括部分上层知识界妇女、家庭妇女及其他无处归口的妇女。

我们运用中华妇女互助会的名义做了难童工作，办了八个女工夜校以及春朗村妇女补习学校等，工作较有成效。现在部队中不少军级干部都是当时的难童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后，一般群众组织都被禁止活动，而妇女互助会由于打着杨虎老婆田淑君的牌子在工部局立了案，仍然可以继续活动。

一九三七年夏，我离开妇委到省委机关，先后搞过党刊发行、电台联系，接待新四军来沪治病的干部等工作。省委党刊《党的生活》由何孟雄之弟何建初负责（当时他改姓刘，以担任夜校事务工作作掩护，现已去世）。一九四〇年该刊物停刊。当时还有一个电台由龚饮冰负责，陈洁负责转送电报，我经常到她那里取电报。中央曾派来两个译报员一收一发，相互不通气，与陈洁亦不相识，这样有利于保密。当时，潘汉年则负责国民党和敌伪方面的情报，与龚不是一个系统，妇委曾介绍张白漪和李素到潘那里工作。皖南事变后，我们曾接待和送走一批突围干部到苏北，如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来沪化装成教师模样，住在沙文汉家里。这一工作大多是王尧山和我做的，后因来沪的同志多了，省委组织部来不及接待，便由较早来沪的杨斌和其他一些同志负责接待。不久就成立新四军驻沪办事处，由杨斌负责，省委交通李志民与他联系。杨因不熟悉地下工作的环境，一九四三年被捕，不过没隔多久就被释放了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，我家住在巨籁达路（现巨鹿路）靠近茂名路。一九三八年夏天搬到蒲石路（现长乐路）红房子西菜社对面。因房子里住的人很杂，二楼住的二房东是大流氓，亭子间住的女人又有婚事纠葛，经常有巡捕来查问，很不安全，于是，我们在一九三九年春天花了一千多元钱，顶下了西爱咸斯路（现永嘉路）慎成里六十四号一幢房子，布置得很阔气，以遮人耳目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省委开会及机关活动都在我家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中央要我们撤退。当时，刘晓与吴雪之开

贸易行经营烧碱，王尧山开文具店，刘长胜也开了烟杂店，其爱人郑玉颜在洋行当打字员，刘长胜与王尧山还当上了保甲长。我们认为掩护得较好，故拖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才撤退。省委机关小组由我和郑玉颜、李淑英（刘宁一爱人）负责。十一月七日，我们撤退到顾家圩子集中。刘长胜与顾以信（俞沛文爱人）、顾以佩取道镇江、瓜洲一线到解放区，在瓜洲被伪军扣留，靠刘机智脱险。一九四二年，江苏省委撤退去新四军淮南地区时，因刘长胜在瓜洲遇险，感到这一条路线不够安全，需要另找路线。当时，潘汉年也奉命撤退，刘晓便与他联系一道走，同行的有刘晓、张本（学委书记）、王尧山和我。我们在法大马路（现金陵东路）潘汉年住处集中后乘车到镇江，来接我们的是徐汉光（伪军）。次日胡璠鹤（伪军，李士群手下师长）又来宴请。我们看胡璠鹤穿一身伪军服装，颇为疑虑，潘汉年即告知，这批人投靠汪伪，但与蒋有矛盾，愿为我们工作。后来徐汉光亲自用船把我们送到仪征，再到边区与乡长接好头，我们才安全抵达解放区。

（上海党史调查组 刘钢、钱玉民、曹保天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访问整理）

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

孙 冶 方

从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到一九三九年，我一直在上海工作。“七·七”事变前夕，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尧山约我到沙文汉家中，通知我正式恢复党的组织关系，并分配我和王翰一起搞学委的工作，当时，讲明王翰即将调离，由我接他的工作。胡乔木的一个妹妹(当时在暨南大学)也参加学委，我们就在她家里开会。

“八·一三”淞沪战争打响以后，当时上海党内负责管学委和文委的沙文汉通知我调到文委工作，唐守愚接替我搞学委。沙文汉还说：文委的党员关系，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向你移交。参加文委的同志，都是我原来熟悉的，有夏衍、钱俊瑞、曹荻秋等，由我担任文委书记，曹荻秋为副书记，分工搞文委的党务工作。为什么组织上指定我担任书记呢？夏衍是老党员，社会地位比我高；钱俊瑞社会地位也是高的；曹荻秋的关系是潘汉年交给我的，他刚从监狱出来。他们都是出头露面或受人注意的人物，组织上曾经决定，如果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，他们都要调离上海。而相对来说，我比较不引人注目，容易隐蔽，能够坚持下来。正式成立文委的会议是在汪光焕家里举行的，而汪光焕没有参加会议。后来，我和钱俊瑞等一起开过两次文委会议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，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，夏衍、钱俊

瑞都调到大后方，曹获秋也离开了上海。以后参加过文委的有唐守愚、梅益、王任叔、姜君辰、林淡秋、顾准等。顾准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职委调到文委担任副书记的。

一九三七年底或一九三八年初，潘汉年对我说，他调动工作了，“八办”主任改由刘少文担任，今后文委工作由刘少文联系。从此，文委的上层统战关系由刘少文负责，文化政策、党务等工作由我负责。这样，文委系统有些党员关系又移交给“八办”。

上海租界地区沦为孤岛以后，在江苏省委和“八办”的领导下，文委利用租界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、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开展工作。

戏剧界在发动群众坚持抗战，教育群众发扬民族正气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。“八·一三”期间，在文委领导下，话剧界曾有十二个救亡演剧队。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，还有两个演剧队留在上海继续开展救亡演出。当时上海话剧界有两个摊子的工作：一是于伶负责的专业话剧团的工作。先是成立青鸟剧社，团结一批电影、话剧界的同志，占领上海舞台，坚持和日伪的殖民地文艺、汉奸文艺开展斗争。夏衍的《赛金花》、《上海屋檐下》在孤岛时期都曾演出过，影响很大。有些学校的学生工作，就是通过话剧打开局面的。二是杨帆负责的各业余话剧团的活动。当时职业界、学生界、妇女界等群众团体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。业余话剧团先在新光大戏院、璇宫剧场演出，后来在新世界商场下面绿宝剧场（现市百一店对面）演出。各业余话剧团轮流在每星期日演出一次，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周恩来知道后，曾经称赞：“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！”

这一时期，文化界还搞了大量的创作、出版工作，如编辑出版《译报》、《译报周刊》等，由张宗麟、梅益等主要负责，张宗麟是直接由“八办”领导的。我没有参加过《译报》的董事会，而我們和《新闻

回 忆 录

报》、《申报》都有联系。《申报》第一版要电的主编是冯宾符的哥哥冯都良，三十年代《申报》的许多社论都是冯都良撰写的。

另外，歌咏队、读书会的工作也都很有成效。

孤岛时期，上海曾派出了两批慰问新四军的代表团。第二批由文化界张宗麟负责组织，杨帆、王元化等参加。开始时，党组织并没派杨帆去，张宗麟对我说，这一批代表中一个党员也没有，却杂有国民党特务，杨帆很有办法，一定要杨帆去参加。后来，刘少文也向我打了招呼。我原以为杨帆去一个月就会回来的，没想到项英把他留在新四军工作了。

（上海历史研究所 张义造、沈忆琴一九七九年六月、
一九八一年一月访问整理）

江浙区委派我去浙江工作的一些情况

蒋 振 东

我原在引翔港上海总工会第二办事处工作。一九二六年，杭州地委需要充实力量，江浙区委派我到杭州去工作，并委任我为杭州地委职工部主任。杭州地委书记是顾作之，浙江硖石人。杭州地委开会决定，我分工负责职工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。具体领导庆成、虎成、伟成等绸厂的支部和印刷、烟刨、闸口铁路工人等单位的支部，一个混合支部，还有几个小厂支部，共十一个党支部。杭州绸厂工人较多，有六、七万人。

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，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。盘踞在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等省的军阀孙传芳是北伐军打击的一个主要对象。孙传芳在战场上屡打败仗，节节后退。他在杭州也加紧镇压革命的力量。一天晚上，我去杭州头发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，参加混合支部的一次会议。会议正在进行中，突然孙传芳的部队包围、查封了省党部，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人都被捕了。被捕的有四人，一个是我、一个是章松寿、一个是分管技术的书记，另外一个是非党员。省党部的一个交通（共产党员），乘混乱之中逃脱了。那天晚上，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胡识英（共产党员）和她的丈夫郑惺臣（共产党员）刚从温州出来，没赶上这次会议，才未遭逮捕。后来，我被判刑八年，那位非党同志也被判八年，章松寿和技术书记判了五年。到了十月，我们突然被释放了。原来是夏超独立，释放